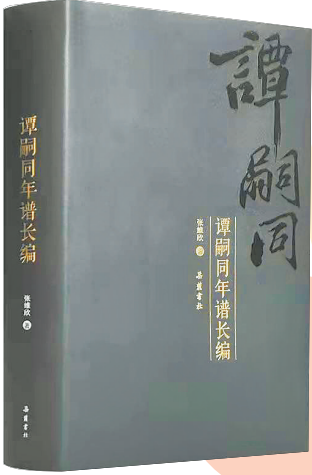




后来凭吊意
分付此山川

——《谭嗣同年谱长编》创作谈

张维欣

从二十六岁到三十岁,经过了资料收集、实地踏访、写作和不下十次的校稿,《谭嗣同年谱长编》终于付梓。由于一些原因,本书延迟近三年至今方才出版,其间各种新史料的发现、新观点的提出,均因此而十分遗憾未能收录,只能待再版时完善。

这本并不完美的作品,是我青春的见证,也是我对一个百年先贤羹墙之思的寄托。

十九年前,我在初中历史课本上第一次了解到谭先生其人其事,他成了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偶像”。高中毕业后,我来到离家千里的湖南大学就读,先生所执教的时务学堂是这所高校的前身,传承先生思想,实我终生之幸。

在建筑系读研期间,因导师柳肃教授之缘故,我有幸参与设计了浏阳谭嗣同故居纪念馆广场。这个广场于2015年,也就是谭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建成。后来在我工作后,又参与设计了谭嗣同纪念馆的展陈。

在湖南的七年时间,我屡次赴浏阳为先生祭扫。但直到购得1981版《谭嗣同全集》及《谭嗣同真迹》等书籍时,我方才真正了解先生的思想与学养。

先生之诗文俊逸秀美,笔法纯熟却又不敢作卖弄;先生琴艺精湛,自听崩蹙、残雷,并在岳山内雕有梅花,焦尾雕灵芝云纹及藤蔓纹,高洁雅致;先生之思想深邃幽远,将今文经学、大乘佛学、自然科学熔于一炉,令人犹不能及;先生人品贵重,于友朋无分贵贱均坦诚相待,倾囊相助,于妻子则磐石不移,伉俪情深,于兄妹则关爱有加,情真意切;先生笔耕不辍,勤奋有加,虽生而三十三载,却学养深厚,中西文理皆有造诣……

在阅读了不少史料之后,我决心动笔撰写《谭嗣同年谱长编》。年谱梳理是一个痛并快乐的过程,所要阅读之史料浩如烟海,许多史事扑朔迷离,各方记载又不尽相同,需耐心甄别、辨伪。加之先生虽一生精勤劬瘁,却无日记留存,信札又多不署日期,诗文亦较难系年,资料分散,只有反复考证,方能使疏误稍减,使内容更为完备。

这几年来,我将文献史料系日排比,钩稽考订,史料笔记堆满案头。撰书时,除常见史料如《唐才常集》《梁启超全集》《谭研资料汇编》等需完全吃透以保证运用自如外,亦需运用大量以往研究中未曾运用的史料才能使《年谱长编》更具价值,如夏曾佑、唐煊、谭延闿等人日记,黄彰健、杨步伟、黄宾虹等人回忆录,《盛宣怀未刊信稿》《苏曼殊文集》《傅兰雅档案》等图书报刊,以及一些罕见海外史料如日本国立公文书馆《陆军省大日記》等。

整个过程十分不易,在写作《年谱长编》的同时,我又同时承担了湖南电视台纪录片《我们的谭嗣同》撰稿、浏阳谭嗣同纪念馆的布展撰稿、新编《谭嗣同集》整理……白天上班,只能依靠所有的晚上和节假日来完成。虽日日夜夜,年节无休,几乎付出了一个年轻女孩所能付出的一切青春时光,但为先生,我别无怨言,甘之如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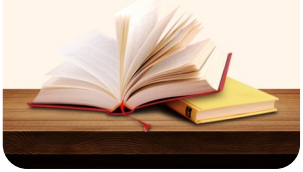
所幸直到现在,我也逐渐为谭嗣同的各类研究者所知,无论是央视拍摄《中国影像方志·浏阳篇》,还是许知远的纪录片《十三邀·谭嗣同》,亦或是湖南卫视纪录片《岳麓书院》,凡有涉及谭嗣同的部分,皆会找我去出谋划策、撰稿顾问。

我爱重和敬仰谭先生,视之为我之师长与引路人。先生是一个被历史尊崇而又忽视的人,人们提起他,首先提及者就是他的就义,其次再提到他的政治主张与哲学思想,却往往失之片面,甚至曲解。至于他剑胆琴心的才情、冰雪情操的品格、率性可爱的个性则鲜有人关心。

用我全部的青春与爱,感谢和致敬这位陪伴我十七载的青年思想家,感谢他让我于弱水三千与滚滚尘世之间,找到了我人生最大的意义。“后来凭吊意,分付此山川。”

(《谭嗣同年谱长编》张维欣著 岳麓书社出版)

悦读



书里书外

拜根兴

摆在读者面前的近百万字的煌煌大作,其作者为高级记者、资深电视媒体人常华。常华曾出版《唐诗密码》《宋词密码》《诗词里的中国》等多部专著,多次举办过以“唐诗宋词里的中国”为题的公益讲座,是一位勤思耕耘有年,在国内颇有影响力的诗人、作家。

和常华认识相对较晚,记得2019年元月末收到常华发来的邮件,说是想加入中国唐史学会,介绍人是著名唐五代史专家、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杜文玉教授。从邮件中得知常华大学时就出版过《唐诗神韵》一书,后来专注于“以诗证史”,开辟网络论坛专栏,和网友互动,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粉丝受众,在网络新媒体领域极具影响力。

当然,在此也应提及常华的家学渊源。他的父亲常万生教授毕业于东北师大历史系,出版有《女皇武则天》《口蜜腹剑李林甫》等十余部著作,在学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著作风格,深受读者的喜爱。

我本人喜欢学界同仁们的跨界研究,因其看问题的视角超乎寻常,论证思路也别出心裁,故往往有惊人的见解观点出现。

今年四月初,常华和我联系,并通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部寄来他的新作书稿,说是书稿准备出版,希望我审校稿件,当时感到有点为难。其一,本科、硕博生授课时间紧张,学会事务及其他杂事繁多,没有整块时间审阅书稿。其二,书稿以唐诗为主线素材,探讨唐代历史发展演变之规律,审视唐代文人的文化心理和精神轨迹,唐代民俗礼仪和世风流变,而我虽在以往的研习中对唐诗、唐代诗人行迹也有涉猎,但要说研究根本谈不上,所以存有顾虑。

然而,常华打电话一再坚持,出版社编辑也耐心有加,我虽推辞再三但难能脱手。



范思滕

现在城市的体量在不断增大,但很多城市并没有充分展现出自己的个性。我们走在不同的城市,都似曾相识。这多少有点悲哀,尤其是在充满历史厚重和现代时尚的中国。在这个命题之下,金元浦教授关于城市之魂的思考可谓十分中肯和必要。他将城市建设的方针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引用佛家中的一个词“月印万川”,并以此作为他结集出版的书名。

金教授是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方面的专家。他在《月印万川》这本书中这样表述:“一个城市无论有多少历史的、现实的圣典史迹,无论有多少自然的、社会的资源,总是千流一源、万法归宗、理一分殊、一以贯之。我们需要去寻找城市的文脉,那个城市唯一的‘魂’”。城市需要这样的“魂”,需要在一个个的脉络之下找到每个城市发展的途径,告别千篇一律,成为独特的存在。

律,成为独特的存在。在古今中外众多的城市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以参照或者研究的范本。那些被写入范本的城市建设无一不是契合了自身的特质,从而形成了强大的魅力,吸引着全世界的人。



《强国图志——从宣传画里看新中国发展之路》
沈榆、孙七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这是一部以“图像”解读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的大众读物。本书以中国经济发展强国策为主线,选择250张不同时代的宣传画,解读其意义和创作思路,从中可以发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的历史进程。在分析其形象塑造的艺术风格和特征的基础上介绍宣传画的发展历史和艺术形式的演变。

诗歌中的盛唐景象

——谈谈《去唐朝》(三卷本)



在看完书稿后,我愿意和读者朋友分享我的读书体会。纵览全书,我认为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全书分三卷:第一卷在讲唐史过程中穿插诸多唐人诗歌,以诗证史,颇多新意;第二卷从唐代诗人以诗作感应波流云涌的时代风云,透视体察他们的宦海沉浮、人生旨趣,探讨唐代文人的文化心理和精神轨迹;第三卷从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唐诗中,找寻开放包容政策层面下大唐帝国多文化交融的现场密码,以及赋予帝国子民丰富多彩的礼仪风俗空间。通过上述三者的铺垫,作者力图展现历史兴衰中蕴含的诗韵、悲欢离合中富有的家国情怀,更有近三百年大唐芸芸众生的群体风尚,是一部区别于现有学界诸多唐史撰述的别样的唐史研究著作。

第二,众所周知,“以诗证史”为史学大家

陈寅恪所首创,史学研究的新渠道由此肇启,为学界所敬仰和赞赏。区别于历史学者史料的旁征博引,本书作者以唐诗作为透视探讨唐代历史文化的得力抓手,发掘唐诗中特有的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信息,追溯唐王朝的兴衰演变历程,寻觅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蛛丝马迹。如作者引用李世民《望送魏徵葬》《出猎》两首诗,阐述贞观之治开创者唐太宗李世民理政前后的差异,对帝国大厦形同天壤之别的影响;引用杜甫《忆昔》、李商隐《贾至》两诗,反映唐玄宗不同时期的作为。

第三,全书的叙事风格也很有特点。因为作者专注于唐宋文学,不仅对唐诗发展演变历程颇多心得,而且对整个唐代历史多有爬梳,故而行文中以文学的语言阐述历史事件,用语也有别于一般的历史著作,读起来别具趣味和吸引力,有的章节用引人入胜来形容丝毫不为过。同时,作者善于用优美且富含哲理的语言,分析历史事件涉及的人物心路历程,使读者对事件发展的前因后果有更深入的认识。

从上世纪末迄今,在唐都城长安、东都洛阳周边,以及其他唐人活动区域,考古工作者们发掘清理了数以百计的唐人墓葬,唐人墓室壁画、志盖、志石,其他随葬品等考古资料不断出土面世。如果说能对本书提出一些建议或意见的话,笔者认为,作者可依据所述内容,在本书的某些章节穿插一些考古文物图片、地理分布图表,做到图文并茂,必然能够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增强论述的力度,有利于读者理解书中所论。

期待作者再接再厉,继续发掘唐诗中无穷无尽的闪光点,咏唱大唐开放包容编织出的繁荣昌盛,出版更多文史兼备的高质量著作,服务读者,造福社会。

(《去唐朝》(三卷本) 常华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读有所得

城市,以及它的灵魂

——读《月印万川:寻找城市之魂》

律,成为独特的存在。

在古今中外众多的城市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以参照或者研究的范本。那些被写入范本的城市建设无一不是契合了自身的特质,从而形成了强大的魅力,吸引着全世界的人。

城市和人一样,都需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在时间中的位置,在空间中的位置,以及在群体中的位置。但是不管是哪个位置,只要选择了,那必然有选择的原因,也必然会产生效果。金教授从书中告诉我们,城市的许多种可能,在不同的功能选择和价值取舍的背后,呈现出“品牌城市”“创意城市”“宜居城市”等多种类型。这些简单的概括虽然不能将城市一概而论,但是从这些类型上,我们可以管中窥豹,体会到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印记。

这些城市已经照耀进了现实。但是城市的未来依旧让我们值得期待。金教授提出的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的概念,是令人十分憧憬的。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不仅仅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和面积的扩大,它其中包含的元素十分丰富,从产业发展到城市布局,从生活宜居到交通出行,从城市配套到就业保障等等,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但是在金教授看来,一座城市的创意文化发展,才是城市发展的“画龙点睛”之笔。因为只有创意文化发展,才能有效整合起一座城市的文脉,才能为城市打上自己的“身份证”。似乎在城市的发展历程上,也能印证那句话——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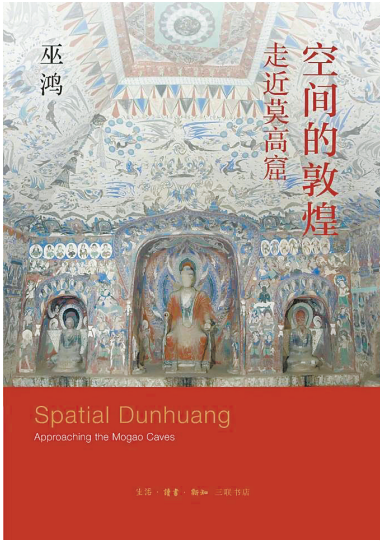
那么在中国,这一切的构想是不是现实?国内众多城市以实际行动来代替回答。在北京,要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文化中心;被称为魔都的上海,具备了创造一切的魔力;大湾区城市群中衍生出的创意经济让该地区经济直线腾飞;深圳,又充满了快步走向国际化大都市的青春气息。甚至在一些西部地区的城市,也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变化。

在金元浦教授看来,“城市是一件富有魅力的艺术品,我们要像雕琢一件艺术品一样来精心地雕琢一座城市”,这大概是他对于“月印万川”最好的诠释。月亮印照下的万川,各具风采,各领风骚。

城市是人类的栖身之所,除了要满足我们的日常所需之外,更承担了我们的情感寄托的功能。而中国文化的长处恰好在于更能抚慰人的心灵,让我们不再面对现代城市病的时候手足无措。在中国哲学的影响下,城市的建设更能实现艺术化的发展。金教授讲到,“用艺术的方式解决城市的社会公共问题”,大概就是一种思路。因此,中国的城市可能在将来更具人性化,更温暖,而艺术的发展恰是这一切的表象,因为我们骨子里一直追寻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城市建设不仅仅是钢筋水泥的拼凑,《月印万川》这本书告诉了我们城市应该具备什么样子的“魂”。不管这个城市身处何地,只要拥有了自己的语言表达,不管大小几何,不管新旧如何,都是值得期待的。

(《月印万川:寻找城市之魂》金元浦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图书摘读

巫鸿

关于莫高窟的起始,学者多定为366年,当时敦煌辖属于前凉政权。相传那年有个名叫乐僔的和尚,戒行清虚,希望找个恬静的地方修道。当他来到宕泉河畔鸣沙山麓,“忽见金光,状有千佛”,于是在山上“架空凿险”,修建了莫高窟的第一座石窟。

对于乐僔的生平我们全无所知。后人常根据9世纪的《莫高窟记》中“仗锡西游至此”一语推测他是东来的中土僧人。但正如敦煌史研究者李正宇注意到的,当这个事迹首次在《李君莫高窟佛龕碑》中记述时并没有“西游”二字。

这通石碑立于武周圣历元年(698年),比《莫高窟记》早150年以上,碑文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止此山”。如果说“仗锡西游”隐含了长途跋涉的辛劳,“杖锡林野”则更多地表达了悠游山林的情思。因此,莫高窟的开创者不一定是个外来的游方僧人,而是位当地的禅修和尚。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设想他属于敦煌的某个佛寺或教团,这类地方宗教机构在4世纪肯定存在。

根据1991年的一个考古发现,我们知道甚至在2世纪之前,敦煌就已经有称作“小浮屠里”的去处。这一知识来自敦煌附近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一枚汉简,历史学家荣新江据此推论:“也就是说这个里坊中有‘浮屠’——佛塔或佛寺,因此得名。”我们可以继续推想,既然有“小浮屠”,那么也必然有被当地居民称为“大浮屠”的更具规模的佛塔或佛寺。

在荣氏看来,“浮屠”存在于汉代敦煌的事实说明了佛教在该地的深远传统,为敦煌高僧竺法护(约229—306)在西晋时期的出现提供了历史背景。法护原姓支,是世居敦煌的月氏移民后裔,八岁出家从师姓。虽然他一生中去到各地弘化游历并在长安建寺修行,但与敦煌的关系从未中断,曾率弟子在此译经布道,时人称之为“敦煌菩萨”。他的弟子竺法乘也“西到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到了东晋和前凉,敦煌又出了单道开、竺昙猷等高僧,均以修习禅法知名于世。此二人活动时期正与乐僔在三危山上“造窟一龕”的时间重合,因此莫高窟从其创始之初就与敦煌本地文化密切联系,是这一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

这种联系虽然在理论上不难建立,但在当下对敦煌艺术的研究中却往往缺失。现在的熟悉做法,是不加思考地把“敦煌艺术”等同于“莫高窟佛教艺术”,因为莫高窟千佛洞中的辉煌壁画与雕塑构成了当地古代美术和视觉文化的主要遗存,吸引他们把全部注意力聚集在这些艺术作品上。

但这个跳跃的后果,是在基本概念中取消了将“敦煌艺术”作为更为宽广而多元的领域去调研和思考的必要性,因此也阻碍了对莫高窟的文化环境和特定功能的理解。17年前笔者曾在纽约的亚洲协会做过题为“什么是敦煌艺术?”的讲话,提出我们需要记得敦煌是一个更广大的社会地理空间,而莫高窟——一个位于敦煌南端25公里处的佛教建筑群——只构成这个地理空间的一部分。

中古时期敦煌地区的生态条件及地理景观和现在非常不同,敦煌城内外亦存在着多处宗教和礼仪建筑,不仅有礼拜佛院和授习佛教的场所,也有道教、儒教、祆教以及地方宗教和祖先祭拜的地点。我们不难理解这种多中心视觉文化的社会条件:中古敦煌是一个移民城镇,居住着来自不同地区、具有不同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的人。要理解莫高窟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把它和同时同地发展起来的其他文化和视觉传统联系起来,在同一文化空间中观察和分析。

我们应该发掘这些联系,通过重构敦煌地区的多元视觉文化空间,把莫高窟放到这个空间中去想象和理解。

(本文节选自巫鸿著《空间的敦煌:走近莫高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敦煌的莫高窟艺术与自然